

# 客观分层与主观建构： 城镇居民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sup>①</sup>

——对既往相关研究的梳理与验证

李 飞

**摘要：**本文对城镇居民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社会经济地位、生活经历、制度分割三个假设对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有显著影响。在社会经济地位假设中，职业地位指数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长、年收入越多、行政级别越高，其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就越高；在生活经历假设中，消费水平越高，相对剥夺感越弱，生活品位越高，父辈职业声望越强，其主观认同的阶层也就越高；在制度分割假设中，户籍、区域和单位级别都对主观阶层认同影响显著，说明国家政策的分割效应非常明显。而单位性质对阶层认同的影响更多是通过单位级别来实现的。

**关键词：**阶层认同 社会经济地位 生活经历 制度分割

作为社会学领域中的显学，社会分层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sup>②</sup>。不同的研究者分别从各自的研究预设出发，采用不同的标准对人群进行阶层划分。如赖特(Wright)的新马克思主义框架，戈德索普(Goldthorpe)的新韦伯主义图式(EGP图式)等在学界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国内，陆学艺教授的“十大阶层”(2002)、刘欣教授的“五大阶层”(2007)、林宗弘和吴晓刚教授提出的中国版新马克思主义分类框架(2010)等也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的问题是，当研究者将某一群体划入某一阶层时，这一群体自身是否认同？研究者是否意识到他们已经在不自觉中参与了“他者的建构”？作为群体自身，他们的“主体建构”又是什么呢？即他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又是怎样的情况？

国外学者对主观阶级意识与阶层认同<sup>③</sup>的探讨如火如荼，而主观阶级意识的考察在国内社会分层领域的相对缺乏已然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也有学者将主观阶层认同纳入到研究视野当中，并对此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刘欣,2001;郑晨,2001;王春光、李炜,2002;李春玲,2003、2005;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2004;李培林等,2005)，特别是一些学者对依据客观指标分类出的阶级或阶层，是否具有或形成共同的阶级阶层意识进行了反思(聂元飞,1989;李春玲,2004)，但更多是将其作为模型的一个自变量来解释其他事物(李培林,2005;卢福营、张兆曙,2006;刘欣,2007;等等)，相对缺少将其作为因变量进行重点、细致地研究。鉴于此，本文将研究议题转向主观阶层认同，将阶层认同作为一个分析结果(因变量)，重点分析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人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全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基础，主要回顾以往关于阶层认同研究的相关理论；第二部分总结梳理阶层认同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第三部分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介绍用于统计检验的数据和变量；第四部分将建立统计模型并对模型运算结果进行解释和分析；第五部分将总结本次研究的相关发现。

① 本文系[基金项目]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学子项目“农村流动人口与同城化研究——以社会动员为视角”(13ZHFD07)和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纠纷解决中的主体建构——对农村“民转刑”案件的法人人类学研究》(12YJC84006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② 李春玲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具体参见李春玲,2009,《社会分层研究与理论的新趋势》，《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jgyfc/t20050406\\_5608.htm](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jgyfc/t20050406_5608.htm))。

③ 严格意义上讲，阶级认同与阶级意识是有差别的。从阶级意识发展的理论脉络上看，阶级认同是阶级意识发展的初级阶段，是层次最低最根本的阶段(吴乃德,1992)，因而研究阶级认同也就是研究阶级意识的发展脉络。本文无意在二者之间做过多的纠缠，在进行理论回顾和梳理时，有时会将其作为同一个概念。刘欣等学者对此进行了较为清晰的辨识，具体参见刘欣,2001,《转型期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社会学研究》第3期。

## 一、阶层认同与阶级意识的理论回顾

阶级认同是阶级意识发展的初级阶段,对阶级认同的梳理就需要了解阶级意识的理论脉络。对阶级意识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马克思。他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指出:“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转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自为的阶级”(马克思,1961:134)。由此可知,马克思所言的阶级是有差异的,一个是自在阶级,一个是自为阶级。前者是由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客观经济地位决定的,后者不仅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制的影响,而且更强调成员确立自己作为归属阶级一员的角色感,即对自身所处的阶级关系有明确的主观认识,这个主观上的认识就是阶级意识的起点。

后继关于阶级意识的研究基本因袭于马克思的研究,但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的理论路径。一种是集体层面的阶级意识取向,即将其看作是阶级作为“群体性实体”的特征,以卢卡奇(Lukacs)、汤普森(Thompson)、米尔斯(Mills)等人为代表;另一种是个体层面的阶级意识取向,即将其理解为个体作为阶级成员的具体属性,以赖特(Wright)、迈克尔·曼(Mann)、吉登斯(Giddens)、戈德索普(Goldthorpe)、杰克曼夫妇(Jackman & Jackman)等人为代表(赖特,2006:244;李炜,2004;吴清军,2008)。

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在其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将阶级意识作为一种超个体的群体性概念,而不仅仅是构成阶级的个体属性。即这种群体性的阶级意识来源于个体,但又具有个体不具备的属性。他明确指出,阶级意识“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人所思想、所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它们的平均值。作为总体的阶级在历史上的重要行动归根结底就是由这一意识,而不是由别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而且只有把握这种意识才能加以辨认”(卢卡奇,1992:105)。

汤普森在继承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突破,特别是摒弃了马克思关于阶级的经济决定论,强调在历史关系中理解阶级经历、阶级意识与阶级形成,注重文化与制度等因素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阶级意识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汤普森,2001:2 前言)。

另一位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理论家赖特·米尔斯也沿着集体层面的研究路径对阶级意识进行了界定。如他认为阶级意识应当包括:对本阶级利益的理性认识;对其他阶级利益不合理性的认识及有意识的反对;对运用集体政治手段达到集体政治目的以实现自己利益的认识及随时行动的准备(米尔斯,1987:363-364)。如上所述,在阶级意识的发展脉络中逐渐出现了另外一种研究路径,即个体层面的阶级意识取向,从而与集体性的阶级意识取向分道扬镳。赖特是较为明确在个体层面使用阶级意识的理论家,主张将阶级意识理解为个体作为阶级成员的具体属性,因为在他看来集体并不是有思想、能思考的实体。他在《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一书中提到,“我将用阶级意识概念去指个人主观性的特定方面。因此,意识将作为一个严格的微观概念来使用”。他还指出,“意识的阶级特性是指意识中那些影响个人实际上是如何在一定的阶级关系结构中发挥作用的,以及影响这些关系本身的方面”,从而“使用的阶级意识的测量,被设计成旨在用一般方法开掘与工人阶级或资产阶级利益相一致的个人所持态度的范围”(赖特,2004:389-393)。在这个意义上,赖特基本否定了阶级意识作为集体概念的性质。

此外,持这一取向的学者在阶级意识的问题上大多坚持“过程性”的立场,即认为阶级意识是一个发展、深入的过程。例如奥尔曼(Ollman)就认为从工人情境发展阶级意识需要有九个步骤(Ollman,1972,转引自吴乃德,1992:118-119)。相对而言,迈克尔·曼在阶级意识的界定上更为清晰、精炼。他提出阶级意识的形成主要有四个步骤,即:阶级认同、阶级敌对、阶级的整体性和对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追求(Mann,1973,转引自吴清军,2008)。吉登斯也基本承袭了个体主义的研究取向。他将阶级意识概念化为阶级认同意识、阶级冲突意识和革命阶级意识三个方面(Giddens,1973,转

引自李炜,2004)。台湾学者吴乃德将阶级意识的基本要素总结为三个方面,即:对自身阶级的认同、对自身特殊的阶级利益的认知、对改变现有秩序可能性的认知。他认为这是“阶级意识的不同面向,也是阶级意识发展的不同阶段”(吴乃德,1992:116-117)。大陆学者也基本是在个体意义上使用阶级意识,刘欣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他明确指出,阶层/阶级意识<sup>①</sup>不是一个集体意识的概念,“它所指的是居于一定社会阶层地位的个人对社会不平等状况及其自身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意识、评价和感受。所强调的是个体的心理和意识状态”(刘欣,2001)。

由此可见,对阶级意识的界定经历了一个从集体宏观向个体微观转向的过程。现今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阶级意识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毛洁雯,2009)。由于宏大叙事的式微以及个体微观取向在实际研究中更具操作性,因而大多研究均是在个体层面展开。作为阶层/阶级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观阶层认同反映的是“个人对其自身在阶层结构中所处位置的感知”(Jackman & Jackman, 1973)。阶级认同虽然是最低层的阶级意识,然而正是由于其层次最低,它也是最根本的阶级意识(吴乃德,1992:117)。本文对阶层认同影响因素的研究也遵循从个体微观层面出发,具体考察阶层认同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并分析这些因素之间的有机联系。

## 二、阶层认同影响因素的理论回溯

关于阶层认同影响因素的探讨,学界大致有四种观点:结构地位论、历史文化论、国家中心论和精英策动论(冯仕政,2009:163-164)。囿于数据限制和假设的需要,本文仅选择前三种视角进行理论回溯。

### (一)结构地位论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个阶层/阶级的认同是由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至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包括哪些方面,又存在“一元论”和“多元论”之分。在很多学者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持的是一元决定论观点,即认为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归根结底取决于他的生产资料占有情况,从而形成不同的阶级认同(冯仕政,2009:163)。而韦伯主义则持的是多元论观点,即认为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取决于财富、权力和声望等多个方面。

经典马克思主义过于强调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取决于其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这种观点日益式微,逐渐被其他理论盖过(Hodge & Treiman, 1968),其中就包括利益群体理论(interest-group)。利益群体理论又称为修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看到了马克思以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区分阶级的“简单化”,在承认经济因素对个人阶级地位有重要影响的同时,又引入了收入、教育、职业等变量对阶级地位和阶级意识进行分析。而这些观点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Centers, 1949, 转引自李培林等,2005:47-48)。国内方面,相关研究也从收入、教育、职业等方面考察了其对主观阶层认同有显著影响(王春光、李炜,2002;李培林等,2005:61-72;翁定军、何丽,2007)。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观点从根本上看还是坚持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主观阶层认同的决定作用,对其他影响因素的讨论相对较少。

秉承韦伯主义的多元论则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后继理论在解释阶层认同方面的一些缺陷。在这一问题上,韦伯就明确反对狭隘的经济决定论,注重社会分层的多重维度。杰克曼夫妇也认为阶层意识的基础不仅仅是客观经济利益的差别,还应建立在权力、文化、社会声望等各种资源不平等分配的基础上(Jackman & Jackman, 1973;刘欣,2001)。

### (二)历史文化论

历史文化论具有强烈的建构色彩,它强调历史文化、生活经历是影响阶层认同的重要因素。持

<sup>①</sup> 刘欣将“阶级意识”和“阶层意识”做了区分讨论,本文在广义层面将二者通用。

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从理论脉络的沿袭上看,汤普森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他并不否认经济结构是阶级形成的客观条件,但他指出,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不能将其简单归结为经济关系的衍生物(陈峰,2009)。在汤普森看来,“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汤普森,2001:1 前言)。同时他也提到,“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会),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汤普森,2001:1-2 前言)。可见,阶级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生成的,而这里的“历史”不是马克思所言的“大尺度的历史”(冯仕政,2009:163),而是日常的生活史。在汤普森看来,客观结构地位不会自动生成阶级认同,而是需要人们日积月累的生活和体验,即“阶级经历”才是阶级认同产生的基础。

韦伯较早地将生活经历、生活方式的概念引入到阶级分层领域。在韦伯看来,除了依靠财产多寡来区分阶级维度,生活风格和社会声望的等级也是非常重要的衡量标准(刘精明、李路路,2005)。他强调“身份”表现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具有相对封闭和稳定的特点(马克思·韦伯,1997(下卷):254-255)。

此外,文化对阶级的建构作用也为鲍德里亚(Baudrillard)、干斯(Gans)和布迪厄(Bourdieu)等人所提倡。对鲍德里亚而言,消费最重要的是符号,而不是物品自身。由于符号本身已被设定附带某种意义和价值,如地位、声望及时尚等,因此符号价值是带有“差异性”的。一旦人们进行消费,就意味着与他人可以“共同拥有同样的编码,分享那些使您与另外某个团体有所不同的那些同样的符号”(鲍德里亚,2008:76)。干斯(Gans)对阶级与文化、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探讨。他区分了五种以阶级为基础的品位文化:高雅文化、中上层文化、中下层文化、下层文化、准民俗下层文化(转引自周怡,2003)。布迪厄是考察阶级与文化、生活方式之间联系的集大成者。其核心概念“惯习”是指一定社会阶级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思想、行为所带有的特定倾向,惯习的产生过程也就是阶级形成的过程(Bourdieu,1987,转引自刘精明、李路路,2005)。他认为,生活方式、消费、文化、品位等元素在各阶级之间形成明显的“区隔”,而这种“区隔”在维持本阶级认同的同时,也在实现一种认同的再生产。

### (三)国家中心论

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展,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会产生共同的阶级意识,实现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目标,从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就能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然而现实并没有按照马克思所设想的方向发展,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不同的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意识,这也成为后来学者研究的中心议题:为什么马克思的理论会失效(毛洁雯,2009),是何种因素导致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处于相同地位的群体却产生了不同的阶级意识?

很显然,结构地位论和历史文化论对这一问题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以卡兹尼尔森(Katznelson)等人为代表的国家中心论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国家中心论认为,国家是特定疆域内权力最大的机构,它在塑造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认同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理解阶级认同形成的关键是分析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组织制度和社会政策(冯仕政,2009:164)。因此,国家中心论者一直致力于把“国家”重新带回理论的视域中。《把国家带回来》(Bring the State Back In)一书则宣告了这一学派的诞生(陈峰,2009)<sup>①</sup>。

作为国家中心学派的主将,卡兹尼尔森强调国家对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工人运动模式以及策略

<sup>①</sup> 具体参见陈峰《国家、制度与工人阶级的形成——西方文献及其对中国劳工问题研究的意义》,该文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国家”在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陈峰,2009)。

的关键影响。按照卡兹尼尔森的观点,阶级的形成体现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意识倾向以及集体行动四个层面,那么至少后两个层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因素的制约和影响(Katznelson, 1986, 转引自陈峰, 2009)。而国家视角也是卡氏在解释 19 世纪欧美工人阶级不同形成模式的理论基点。卡氏的合作者左尔伯格(Zolberg)通过个案比较也证实了多样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形成模式会带来工人阶级在阶级认同与集体行动上的多样性。此外,霍布斯鲍姆(Hobsbawm)和埃里(Eley)等人也都提到了国家在工人运动和阶级认同形成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强调应该把国家从后台推向历史讨论的中心(吴清军, 2006)。

综上所述,结构地位论、历史文化论和国家中心论分别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阶层/阶级认同的影响因素。下文将报告利用既往研究提供的理论资源建立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操作化研究。

### 三、假设、数据与变量

#### (一)理论假设

从结构地位论、历史文化论到国家中心论,基本上可看作是遵循着“个体<sup>①</sup>—生活—国家”这样一个从微观到宏观、从个体到结构的思路。本文在进行操作化假设时,也将沿用这一思路。具体操作化为三组假设,即社会经济地位假设(个体)、生活经历假设(生活)、制度分割假设(国家)。

##### 1. 社会经济地位假设

该假设基本沿袭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即认为个人的主观阶层认同是由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如上文所述,职业、教育和收入是最常采用的变量,利益群体论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个体特征确实对主观阶层认同有显著影响(Hodge & Treiman, 1968; Jackman & Jackman, 1973)。多元论也主张除了考虑客观经济地位的差别,还应充分重视权力、社会声望等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对阶层认同的作用(Jackman & Jackman, 1973; 刘欣, 2001)。在国内研究方面,众多学者对在转型社会背景下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阶层地位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结果也基本证实了以职业、教育和收入为指标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主观阶层认同的显著影响,并且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主观认同的阶层就越高(王春光、李炜, 2002; 李培林等, 2005: 61 - 72; 胡荣、张义祯, 2005)。但在中国的语境下,行政级别本身所负载的经济、组织资源是毋庸置疑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韦伯主义涉及的“权力”做出回应,因而本文将之纳入到个人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中,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有所忽视。由此,本文建立以下假设:

假设 1: 个人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主观认同的阶层也就越高。

假设 1.1: 个人的职业地位指数越高,主观认同的阶层也就越高。

假设 1.2: 个人的教育程度越高,主观认同的阶层也就越高。

假设 1.3: 个人的收入越高,主观认同的阶层也就越高。

假设 1.4: 个人的行政级别越高,主观认同的阶层也就越高。

##### 2. 生活经历假设

如上所述,汤普森认为日常生活的经历和体验才是阶级认同产生的基础,因此,从人们的生活方式入手考察主观阶层认同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视角。在汤普森看来,人们的消费方式、休闲娱乐状况、心理感受等等都是日常生活经历的一部分。

布迪厄较早地将社会分层研究引入到消费领域,他认为消费偏好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而消费偏好就是不同阶层的“品位”在消费领域中的实践(王宁, 2001: 93 - 99)。鲍德里亚也指出,消费社会已被物和符号所包围,而符号本身已被设定附带某种意义和价值,如地位、声望等,消费某一符号也就意味着处于某一区隔和阶层。不可否认,消费水平往往与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相联系,但与之有一定的差别。在实证研究方面,李培林、张翼等人以“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和“家庭最大支

① 这里注重的是结构地位论的微观视角,即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其阶层认同的影响。

出项目”为指标来测量消费地位,研究发现,这两个变量对阶层认同的影响不大(如住房面积的回归系数仅为0.001),但都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李培林等,2005:79-80)。而边燕杰和卢汉龙的研究则证伪了这一点,他们指出居住面积不是影响地位观的影响因素,当然他们也提到了这可能与上海是一个拥挤的城市,各个家庭之间的住房面积差别不大有关(边燕杰,2002:524)。

汤普森将心理感受也作为日常生活经历的重要部分。他发现,工人阶级在阶级意识形成时期,虽然收入和生活水平在上升,但他们的不安感却增强了,因为工人从国民产值中分享的份额相对于有产阶级是下降的,即他们从心理上感受到的生活水平在下降(汤普森,2001:361-366)。韦伯也指出,人们之间生活机遇的差别只有形成鲜明的对比时,才会导致阶级意识的产生(转引自刘欣,2002)。这种现象是典型的“相对剥夺感”,即“某一个人或社会群体与同一社会的其他成员/群体相比较,所处的对有价资源较少占有或不占有的状态”,其研究结果也证明了处于相对剥夺地位的人更可能认为社会是不平等的(刘欣,2002)。李培林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相对剥夺感强的人对自己的阶层有更低的认同(李培林等,2005:82)。

布劳和邓肯在研究美国的社会地位获得时,发现在现代美国社会中,以父亲职业为代表的家庭背景情况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有重要影响。虽然对中国社会地位代际传递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李培林等,2005:73-74),但家庭背景作为个人生活经历的重要部分,可能会对个人的阶层认同产生重要影响。李培林等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即父辈的社会地位高低是决定个人主观阶层认同的最重要因素,其影响超过了其他所有的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李培林等,2005:81-82)。

生活品位是日常生活经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上文已有所交代,这里不再赘述。综合以上研究,本文建立以下假设:

假设2: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同,其主观认同的阶层就不同。

假设2.1:个人的消费水平越高,即处于更高的消费分层位置,其主观认同的阶层越高。

假设2.2:个人的相对剥夺感越强,其主观认同的阶层越低。

假设2.3:个人的父辈职业声望越高,其主观认同的阶层越高。

假设2.4:个人生活品位不同,其主观认同的阶层也就不同。

### 3. 制度分割假设

如上所述,国家中心论持有的是一种宏观结构的视角,它强调国家的政策、性质和行为对阶级认同的影响,相关的研究也证实了国家政策、行为等对阶级意识的形成有显著影响(赖特,2006;曼,2007;冯仕政,2009:164)。需要指出的是,国家性质、行为等很难操作化,在考虑中国特定社会结构、政治等因素的前提下选用四个变量对其进行操作化:户籍、区域、单位性质和单位级别。

作为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典型制度,户籍不仅负载了不同的物质利益,也赋予了人们不同的身份。国家政策决定的个人先赋身份,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人们的阶层认同。中国社会的的不平等除了城乡差异,还体现在地区之间。东强西弱固然有其区位自身的原因,但更大程度是国家政策使然,更多的优惠政策和资源向东部地区倾斜是不争的事实。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有可能在宏观结构层面对个人的阶层认同产生影响(李培林等,2005:83-84)。因此,这里引入区域这一变量。

单位作为一种国家管理制度,在中国社会中具有很强的分割作用,并且这种作用是全方位的(冯仕政,2006)。以往学者研究发现,单位对个人的收入、住房、医疗等都发生着调节作用(边燕杰,2002:515;王天夫、王丰,2005)。此外,单位本身也是一项国家制度,对员工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福利资源的分配方面,还体现在个人的地位观和阶层认同上。其中,随着单位性质和级别的不同,对个人的影响也就不同。边燕杰和卢汉龙的研究就发现,单位的级别对职工的社会地位观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边燕杰,2002:528)。鉴于国家制度具有的分割性,本文建立以下一组假设:

假设3:国家政策、行为的不同,个人的主观阶层认同也就不同。

假设3.1:相对于农村户籍的人,城镇户籍的人主观认同的阶层更高。

假设3.2:相对于中西部,东部地区的人主观认同的阶层更高。

假设3.3:单位的行政级别越高,其员工主观认同的阶层越高。

假设 3.4:单位性质不同,其员工主观认同的阶层也就不同。

## (二)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 2006 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Social General Social Survey,简称 CGSS)<sup>①</sup>。该年度共收集有效样本 10151 个,其中城市地区 6013 个(59.2%),农村地区 4138 个(40.8%)。由于本文以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同时将被调查者的年龄限定在 18-60 岁之间,即通常 60 岁以上的退休人员不在本文的研究对象之内<sup>②</sup>,使用的样本量为 5342 个。在对因变量处理后发现,有 103 个被调查者没有回答。考虑到因变量的特殊性,将这 103 个样本删除,最终的样本量为 5239 个。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城镇居民包含一定数量的农业户籍人口,这其中既有一定数量的农民工群体,也有部分城郊农业户籍成员。之所以保留这个群体,主要是想考察户籍制度这一国家分割制度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另外,本文之所以限定城镇居民,主要是基于单位的考察,因为农村人口大多没有单位,在这一变量上会产生大量缺失值。同时城乡二元分割制度的影响,使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各方面有一定的差异,此处只将城镇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可能会产生更好的模型拟合效果。

## (三)变量

### 1. 因变量

2006CGSS 问卷中有这样一道题目“在您看来,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还是下层?”。如果被调查者在此题没有作答,继续追问“如果一定要让您选择的话,您会认为您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属于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还是下层?”。将这两个题目进行合并,作为本文的因变量。从上层到下层依次为 1-5 分,本文将其近似作为定距变量进行处理。为了便于分析说明,重新予以反向赋值,将从下层到上层依次赋值为 1-5 分,即得分越低,主观认同的阶层越低;得分越高,主观认同的阶层越高。

### 2. 自变量

根据上述假设,本文的自变量也将分为三组,具体如下:

(1) 社会经济地位假设:这一组自变量主要涉及职业地位、收入、教育程度和个人的行政级别。其中职业地位用相应职业的 ISEI 值来测量。ISEI 全称“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是荷兰社会学家甘泽布姆(Ganzeboom)和美国社会学家特莱曼(Treiman)1996 年编制的一套测量职业地位的编码体系。在该体系中,所有职业都根据其经济收入潜力被赋予一定的分值(Ganzeboom & Treiman,1996),理论取值区间为 0-100。用 ISEI 来衡量职业地位的优势在于,它综合考虑了包括权力、声望、教育等因素在内的多种职业特征。需要指出的是,职业的 ISEI 值对于在职者来说是当前职业;对于失业、下岗的人来说则是他们失业、下岗前的职业。同样,后文中涉及到的个人行政级别、单位性质和单位级别都是针对被调查者现在/最后的工作单位。

关于收入的处理,本文采用个人的年收入<sup>③</sup>作为测量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其中该变量所有的缺失值用其平均值代替。为了使收入变量呈正态分布,且波动不过于剧烈,将其取对数处理,其中收入原始值如果为 0,对数值仍为 0。教育程度则直接采用问卷中的问题“从上小学开始算起,

① 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执行,项目主持人为李路路教授,边燕杰教授。2006 年调查采用分层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四阶段的抽样单位分别是:区/县、街道/乡镇、居委会/村委会、住户/居民,其中前三级单位的抽取依据的是“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信息,而对于最后阶段选中的住户/家庭,使用 KISH 表随机选中家中从 18-70 岁成员中的 1 位进行访问调查。范围涵盖除港、澳、台、藏、青、宁之外的全国 28 个省市区的城镇和农村。

② 本次调查城镇居民 60 岁以上的被调查者共有 671 个。

③ 有研究采用的是家庭年收入,如李培林、张翼,2008,《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第 2 期。这里本文采用个人年收入。

您一共受过多少年的学校教育”,即这一变量是一个连续变量。个人的行政级别分为三类:无级别、正科及以下、副处及以上。具体定义及相关说明可见下表2。

(2)生活经历假设:该假设涉及四个方面的变量,即消费水平、相对剥夺感、父辈职业和生活品位。

消费水平由三个变量来测量,分别是每月消费支出、人均住房面积<sup>①</sup>和住房产权<sup>②</sup>。其中每月消费支出的缺失值用该变量的平均值取代,同时做取对数处理。

关于相对剥夺感,问卷中的这道题目可以用来测量:“与3年前相比,您本人在收入、资产、职位、工作条件、社会经济地位有什么变化?”。“上升”赋值1分,“差不多”赋值2分,“下降”赋值3分,即理论分值在5-15分之间,分值越高,相对剥夺感越强;分值越低,相对剥夺感越弱<sup>③</sup>。

父辈职业采用被调查者18岁时父亲的职业地位指数(ISEI),关于该指数上文已经交代,这里不再赘述。

关于生活品位,本文采用问卷中的一组量表“您在闲暇时间从事下列活动的频率是怎样的?”来进行测量。从事活动的频率由低到高依次赋值1-7分,然后采用因子分析析取相应的因子后再进入模型。通过主成分分析和主轴旋转的方法析取了5个因子,5个因子的总方差贡献率达到77.6%。根据各变量在5个因子上的载荷,可以看出各个因子所代表的含义<sup>④</sup>:第一个因子为“网络因子”,表示在闲暇时间经常浏览互联网、网聊和打游戏;第二个因子为“茶酒因子”,表示闲暇时间经常去咖啡馆、酒馆和茶馆;第三个因子为“休闲健身因子”,表示外出旅游、健身锻炼、听音乐和歌剧的频率较多;第四个因子为“阅读因子”,表示经常阅读报刊和社科类书籍;第五个因子为“通俗娱乐因子”,表示经常打牌、打麻将。具体见表1。

表1 生活品位的因子分析结果

	网络因子	茶酒因子	休闲健身因子	阅读因子	通俗娱乐因子
阅读报刊	0.138	0.092	0.133	<b>0.934</b>	0.057
浏览互联网	<b>0.875</b>	0.177	0.151	0.222	-0.063
读文学、社会科学或科技类的书	0.459	0.181	0.367	<b>0.510</b>	-0.087
听音乐、歌剧	0.404	0.053	<b>0.630</b>	0.087	0.053
健身或参加体育锻炼	0.033	0.120	<b>0.867</b>	0.153	-0.005
上网聊天、打游戏	<b>0.897</b>	0.171	0.154	0.062	0.021
外出郊游	0.292	0.484	0.412	0.121	0.140
打牌、打麻将	-0.039	0.201	0.038	0.025	<b>0.971</b>
去咖啡馆或酒吧	0.222	<b>0.844</b>	0.076	0.054	0.112
坐茶馆	0.056	<b>0.881</b>	0.076	0.096	0.094

注:各因子下,粗体数值对应的变量即为归属于该因子的变量。

(3)制度分割假设:该假设由四个变量组成,即户籍、区域、单位级别和单位性质。具体定义及相关说明见表2。

① 在CGSS2006中D28题只需回答建筑面积或使用面积的任何一种情况,本文采用的是使用面积。如果没有使用面积数,则采用相应的建筑面积数,二者均未填答做缺失值处理。关于家庭人数,本文依据的是D10-1题,对每个被调查者的家庭成员进行了计数,其中只计算了过去1个月与被调查者住在一起的成员,然后加上被调查者得出相应的家庭成员数。如果此题未作答,则做缺失值处理,此种处理方法可能排除了只有1个家庭成员即被调查者的情况,特此说明。

② 选择“住房产权”这一变量主要是考虑有的被调查者可能租房的情况。

③ 此处相对剥夺感的操作化与理论预设有一定差距。在理论预设中,相对剥夺感主要是指个体与其他个体的比较,即一种共时性、横截面的比较;而此处的操作化是个体自身的比较,即一种历时性的比较。但限于问卷限制,故采用此种操作化。

④ 对于因子的命名,本文参照了秦广强,2012,《权威阶级图式的建构——基于工作状况和组织权威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政治面貌。

## 四、模型、结果与分析

### (一)统计模型与研究策略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可近似看作连续变量,因而采用普通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OLS 模型)。下文将依次检验上述的三组假设,在检验各组假设时,将分别建立一组嵌套模型(nested models),以更清晰地展示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表 2 本文所用的各变量的定义和说明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变量性质	说明
阶层认同	5239	1.99	0.89	连续	最小值 1,最大值 5
性别	5239			定类	0 = 女;1 = 男
年龄	5239	38.99	11.77	连续	最小值 18,最大值 60
婚姻状况	5239			定类	0 = 未婚;1 = 已婚
政治面貌	5239			定类	0 = 非党员;1 = 党员
职业地位(ISEI)	4606	43.21	12.97	连续	最小值 22,最大值 90
个人年收入(对数)	5239	3.5	1.39	连续	最小值 0,最大值 5.83
受教育年限	5094	10.47	3.24	连续	最小值 1,最大值 23
个人行政级别	5239			定类	0 = 无级别;1 = 正科及以下; 2 = 副处及以上
每月消费支出(对数)	5239	2.9	0.29	连续	最小值 0,最大值 4.30
人均住房面积	4446	23.59	15.92	连续	最小值 1.67,最大值 256.5
住房产权	5239			定类	0 = 无产权;1 = 有产权
相对剥夺感	4013	9.45	2.4	连续	最小值 5,最大值 15
18 岁时父辈职业( ISEI)	5004	36.07	15.46	连续	最小值 22,最大值 90
网络因子	5239	1.18E - 07	1	连续	最小值 -1.93,最大值 3.13
茶酒因子	5239	1.30E - 07	1	连续	最小值 -1.58,最大值 5.23
休闲健身因子	5239	-9.40E - 08	1	连续	最小值 -2.42,最大值 3.02
阅读因子	5239	1.15E - 07	1	连续	最小值 -3.13,最大值 1.98
通俗娱乐因子	5239	3.79E - 07	1	连续	最小值 -1.77,最大值 3.20
户籍	5239			定类	0 = 农业户口;1 = 城镇户口
区域	5239			定类	1 = 东部;2 = 中部;3 = 西部
单位性质	4449			定类	0 = 私有;1 = 公有
单位级别	3653			定类	0 = 地市及以下;1 = 省级及以上

### (二)对假设的检验

下面将根据有关假设分别建立模型进行检验并报告结果。

#### 1. 对“社会经济地位假设”的检验

表 3 报告的是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来解释主观阶层认同的 6 个 OLS 模型。其中 M0 是基准模型,主要是个人背景变量(控制变量)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从上述结果可知,年龄、婚姻和政治

面貌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年龄越大,主观认同的阶层越低;相对于未婚者,已婚者主观认同的阶层相对更低;相对于非党员,党员主观认同的阶层更高。随着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相关变量的引入,从M0到M5,性别这一变量始终都不显著;年龄的回归系数基本稳定,虽然影响力度较小,但在统计上显著;婚姻状况的影响一直都是负向,但在全模型中该变量在统计上不再显著,且作用减小;党员对阶层认同影响一直都是正向,但作用在全模型中已经变得很小,且在统计上不再显著,这说明党员的解释力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来起作用的。表明目前在中国,党员作为一种政治资本所具有的影响力越来越低,从另一个层面也说明本文没有将政治面貌纳入到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是有道理的。

表3 用社会经济地位解释主观阶层认同的OLS模型

		M0	M1	M2	M3	M4	M5
性别(参照:女)		0.03 (0.02)	0.004 (0.03)	0.01 (0.02)	-0.02 (0.02)	0.01 (0.02)	-0.03 (0.03)
年龄		-0.01*** (0.001)	-0.01*** (0.001)	-0.004** (0.001)	-0.01*** (0.001)	-0.01*** (0.001)	-0.01*** (0.001)
婚姻(参照:未婚)		-0.12** (0.04)	-0.11** (0.04)	-0.05 (0.04)	-0.14*** (0.04)	-0.12** (0.04)	-0.07 (0.04)
党员(参照:非党员)		0.34*** (0.04)	0.18*** (0.04)	0.14*** (0.04)	0.30*** (0.04)	0.22*** (0.05)	0.03 (0.05)
职业地位			0.02*** (0.001)				0.01*** (0.001)
受教育年限				0.07*** (0.004)			0.05*** (0.004)
个人年收入(取对数)					0.10*** (0.009)		0.11*** (0.01)
个人级别 (参照:无级别)	正科及以下 副处及以上					0.48*** (0.06) 0.67*** (0.16)	0.24*** (0.06) 0.40** (0.15)
截距		2.47*** (0.04)	1.80*** (0.07)	1.39*** (0.07)	2.15*** (0.05)	2.48*** (0.04)	0.99*** (0.09)
调整的R <sup>2</sup>		4.0%	8.6%	9.3%	6.5%	5.2%	13.7%
F值		55.24***	88.11***	105.03***	73.78***	49.01***	80.48***
N		5239	4606	5094	5239	5239	4504

注:①M0为基准模型,M5为全模型;②表内数字均为未经标准化的回归系数,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③\*P<0.05;\*\*P<0.01;\*\*\*<0.001;④由于个别变量的样本量缺失,因此存在各模型样本量不同的情况;⑤表4、表5的相关备注与表3相同,下文将不再说明。

从M1到M4分别引入了职业地位、受教育年限、个人年收入和个人行政级别4个代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变量。从结果看,4个变量对主观阶层认同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职业地位ISEI每提高1分,主观认同的阶层会增加0.02个单位;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认同阶层上升0.07个单位;个人年收入每增加1个对数单位,认同阶层增加0.1个单位;个人行政级别影响较大,相对于无级别,正科及以下的被调查者主观认同的阶层会上升0.48个单位;相对于无级别,副处及以上的被调查者认同阶层会增加0.67个单位。在全模型M5中,以上四个变量仍具有显著的影响,这样,社会经济地位假设已经全部得到了证实,即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主观认同的阶层也就越高。其中影响作用尤为明显的是个人行政级别。

## 2. 对“生活经历假设”的检验

表4报告的是用生活经历来解释主观阶层认同的6个OLS模型,主要考察个人的生活经历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从上述结果可知,从M0到M4,年龄和政治面貌对阶层认同的作用在统计上有显著影响,但所有控制变量在全模型M5中都不再显著,说明个人的背景特征基本上是通过生活经历发生作用的。

表4 用生活经历解释主观阶层认同的OLS模型

	M0	M1	M2	M3	M4	M5
性别(参照:女)	0.03 (0.02)	0.04 (0.03)	0.02 (0.03)	-0.04 (0.02)	0.03 (0.03)	-0.02 (0.03)
年龄	-0.01*** (0.001)	-0.01*** (0.001)	-0.01*** (0.001)	-0.003** (0.001)	-0.01*** (0.001)	-0.002 (0.002)
婚姻(参照:未婚)	-0.12** (0.04)	-0.04 (0.04)	-0.14** (0.04)	0.05 (0.04)	-0.10* (0.04)	-0.04 (0.05)
党员(参照:非党员)	0.34*** (0.04)	0.21*** (0.04)	0.26*** (0.05)	0.18*** (0.04)	0.32*** (0.04)	0.09 (0.05)
每月消费支出(取对数)		0.36*** (0.02)				0.18*** (0.02)
人均住房面积		0.008*** (0.001)				0.005*** (0.001)
住房产权(参照:无产权)		0.14*** (0.03)				0.05 (0.03)
相对剥夺感			-0.12*** (0.01)			-0.08*** (0.006)
网络因子				0.18*** (0.01)		0.14*** (0.02)
茶酒因子				0.21*** (0.01)		0.18*** (0.01)
休闲健身因子				0.11*** (0.01)		0.07*** (0.01)
阅读因子				0.18*** (0.01)		0.16*** (0.01)
通俗娱乐因子				0.03** (0.01)		0.02 (0.01)
18岁时父辈职业地位				0.005*** (0.001)		0.0004 (0.001)
截距	2.47*** (0.04)	-0.25 (0.14)	3.50*** (0.07)	2.08*** (0.05)	2.25*** (0.05)	1.57*** (0.17)
调整的R <sup>2</sup>	4.0%	12.6%	14.4%	16.6%	4.7%	27.2%
F值	55.24***	92.85***	135.95***	116.45***	49.94***	89.46***
N	5239	4446	4013	5239	5004	3315

关涉消费分层的3个变量:每月消费支出、人均住房面积和住房产权均在统计上显著,如每月消费支出越高,阶层认同地位越高;人均住房面积虽然在统计上显著,但影响系数较小,这与李培林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李培林等,2005:79)。相对住房的无产权者,有产权者的阶层认同地位更高,但这一变量在全模型中并不显著。相对剥夺感这一变量对阶层认同的影响显著,二者之间是负向关系,这与李培林等人的研究结论也是一致的(李培林等,2005:82)。说明相对剥夺感越强的人越

容易把自己置于阶层较低的位置。

作为生活品位的5个因子对阶层认同的作用明显,且在统计上显著。如越是更多依赖网络、常去咖啡馆、酒吧等场所,并经常休闲健身、阅读频率高,表明生活品位越高,主观认同自己的阶层也越高。需要指出的是,通俗娱乐因子(打牌、打麻将)在全模型中变得不再显著且回归系数较小,说明该因子与相对高雅的生活品位有些格格不入。

对于个人而言,父辈的职业地位也是一种重要的生活经历。结果表明,父辈职业地位对阶层认同的影响显著,但这种影响非常小,回归系数仅为0.005,且该变量在全模型中变得不再显著,这与李培林等学者的结论有一定出入。究其原因,可能与自变量的选择有关。李培林的研究选用的是“父辈的社会阶层”,而本文采用了相对更为科学的“父辈职业地位指数”<sup>①</sup>。

综上所述,生活经历假设基本得到了证实,即消费水平越高,相对剥夺感越弱,生活品位越高,父辈职业声望越强,个人主观认同的阶层也就越高。其中影响作用尤为明显的是每月消费支出和生活品位因子。

### 3. 对“制度分割假设”的检验

表5 用制度分割解释主观阶层认同的OLS模型

		M0	M1	M2	M3	M4	M5	M6
性别(参照:女)		0.03 (0.02)	0.02 (0.02)	0.03 (0.02)	0.002 (0.03)	0.02 (0.03)	0.02 (0.03)	0.02 (0.03)
年龄		-0.01*** (0.001)	-0.01*** (0.001)	-0.01*** (0.001)	-0.01*** (0.001)	-0.01*** (0.002)	-0.01*** (0.002)	-0.01*** (0.002)
婚姻(参照:未婚)		-0.12** (0.04)	-0.11** (0.04)	-0.09* (0.04)	-0.13** (0.04)	-0.15** (0.05)	-0.16** (0.05)	-0.14** (0.05)
党员(参照:非党员)		0.34*** (0.04)	0.32*** (0.04)	0.34*** (0.04)	0.32*** (0.04)	0.32*** (0.05)	0.31*** (0.05)	0.31*** (0.05)
户籍(参照:农业户口)			0.21*** (0.03)					0.26*** (0.05)
区域(参照:东部)	中部			-0.20*** (0.03)				-0.22*** (0.03)
	西部			0.03 (0.03)				-0.009 (0.04)
单位性质(参照:私有)				0.08** (0.03)		0.05 (0.03)	-0.003 (0.03)	
单位级别(参照:地市及以下) 省级及以上						0.09* (0.04)	0.38* (0.17)	0.39* (0.17)
单位性质*单位级别 (交互项)							-0.34 (0.18)	-0.34 (0.18)
截距		2.47*** (0.04)	2.34*** (0.05)	2.52*** (0.04)	2.56*** (0.05)	2.57*** (0.06)	2.55*** (0.06)	2.48*** (0.06)
调整的R <sup>2</sup>		4.0%	4.8%	5.1%	4.1%	4.2%	4.2%	6.3%
F值		55.24***	53.23***	47.39***	39.21***	33.10***	24.04***	25.49***
N		5239	5239	5239	4449	3653	3644	3644

① 在李培林等学者的研究中,父辈的职业地位采用的是“父辈的社会阶层”,该变量是一个从低层到高层的五级定序变量,在实际处理中将其近似看作定距变量。本文采用的是“父辈职业地位指数(ISEI值)”,是一个相对更科学的定距变量。

表5报告的是用制度分割来解释主观阶层认同的7个OLS模型,主要从结构层面考察国家政策、行为对个人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众所周知,户籍制度具有明显的分割效应,相对于农业户口的人,非农户口的人具有更高的阶层认同。区域的差别效应同样不可忽视,相对于东部,中西部地区的人阶层认同的地位更低,这与李培林等人的结论基本一致(李培林等,2005:83-84)。具体而言,相对于东部,中部地区的人阶层认同会下降0.2个单位,且在统计上显著;西部地区虽然作用方向也为负向,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单位在中国社会中的分割作用是非常强的(冯仕政,2006),本文的验证结果基本证实了这一点。在引入单位性质和单位级别后发现,相对于私有制单位,公有制单位员工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更高;相对于地市及以下单位,省级及以上单位员工主观认同的阶层位置更高,并且这两个变量在各自的模型中统计上都显著。但在引入二者的交互项后,单位性质的回归系数变小,在统计上也不再显著,而单位级别的回归系数则大幅提升(由0.09到0.38),且在统计上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单位性质对主观阶层认同影响的直接作用没有得到证实(假设3.4),其影响效应可能是通过单位级别产生的。

综上所述,除假设3.4未能得到直接证实外,假设3.1、3.2、3.3都得到了证实,制度分割假设的检验基本上是成立的。

## 五、结语

本文探讨了城镇居民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依次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生活经历和制度分割三个假设对个人主观阶层认同的重要作用。现将结论总结如下:

首先,三个假设的影响效应都是显著的。在社会经济地位假设中,职业地位、受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和个人行政级别均具有显著影响。职业地位指数越高、受教育年限越长、年收入越多、行政级别越高,其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就越高。其中,个人行政级别的影响尤为明显。这说明在社会转型背景下,“行政制”身份依然是人们评判阶层地位的重要尺度,行政权力在市场机制导入后并没有明显弱化的趋势,行政关系和行政地位在相当普遍的社会范围内还是人们社会地位及其关系的结构性基础(李路路、王奋宇,1992:71;李强,2008)。数据也表明,相对无级别,正科及以下的人阶层认同地位会上升0.48个单位,而副处及以上的人则会上升0.67个单位。在生活经历假设中,消费水平越高,相对剥夺感越弱,生活品位越高,父辈职业声望越强,个人主观认同的阶层也就越高。其中影响作用尤为明显的是每月消费支出和生活品位因子。消费水平与阶层认同的密切关系很好理解,生活品位的强大解释力则着实令我们吃惊。固然有多变量的原因,但在引入生活品位因子后,表4-M3生活品位模型能解释因变量差异的16.6%,是本文分模型解释力最高的。此外,生活经历假设的全模型(表4-M5)的解释力最高,达到27.2%。且就生活品位各个因子看,其影响效应(回归系数)并不逊于消费支出,由此可进一步证明阶级和阶层认同在生活经历中形成的合理性。在制度分割假设中,户籍、区域和单位级别都对主观阶层认同影响显著,说明国家政策的分割效应是明显的。其中,单位性质虽然在单独的模型中影响显著,但在引入单位性质和单位级别的交互项后,其影响效应减小(由0.08到0.05,全模型甚至变为-0.003),且在统计上不再显著;而单位级别的回归系数则迅速增大(由0.09到0.38),影响依旧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单位性质对阶层认同的影响效应可能是通过单位级别产生的。这种单位级别重于单位性质的现象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讨。

其次,作为控制变量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政治面貌,其对因变量的影响效应是不同的。性别在三个假设的全部模型中均不显著,说明性别对个人的主观阶层认同没有影响。年龄在所有模型中基本呈显著状态,影响方向为负向,即年龄越大,认同的阶层地位越低,但各个回归系数均相对较小,因而这种影响效应非常微弱。婚姻状况大致说明未婚者比已婚者认同自己的阶层地位更高,这种情况似乎不是很好理解。之前有经验研究表明,个体对阶层的认同更多会考虑整个家庭的社

会经济地位(李培林、张翼,2008)。而据常理而言,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一般会比个人更高,也就是说,已婚者应该比未婚者主观认同的阶层地位更高。但本文的结论与之前的预设有一定的出入,今后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相对于非党员,党员认同自己阶层的地位更高,这一点在制度分割假设中更为明显。作为一种体制资本(李路路,1996),在各个假设的分模型中,党员比非党员认同的阶层地位更高。但在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经历假设的全模型中,党员的解释力被个人级别、收入、消费水平和生活品位因子等变量给消解掉了,影响力十分微弱,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亦即,党员身份可能是通过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再影响生活方式,最后对主观阶层认同起作用。也有可能是党员身份直接影响生活方式,而后影响主观阶层认同。如果是后一种,那说明政治身份本身已经生产出一种文化,确切说是一种高消费、高享受、生活安逸的文化,而这与党员传统的艰苦奋斗的文化宗旨相违背(毛洁雯,2009)。

最后,如上所述,本文对三种假设的验证是根据从“个体—生活—结构”的逻辑来展开的。换句话说,制度分割假设作为结构因素应在宏观层面发挥制约作用,因而采用多层模型并将“制度分割”置于高层可能会收到更好的研究效果。另外,笔者原本打算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别将三个假设生成三个潜变量,利用潜变量的中介作用来探讨各个假设与因变量之间的路径关系,但除了社会经济地位假设能够拟合出效果较好的潜变量外,其他两个假设的拟合效果均不理想,随之放弃,不过这也是笔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 参考文献:

- 埃里克·奥林·赖特,2004,《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阶级分析的比较研究》,陈心想等译,裴晓梅审校,辽宁教育出版社。
- 埃里克·奥林·赖特,2006,《阶级》,刘磊、吕梁山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 鲍德里亚,2008,《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 边燕杰主编,2002,《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三联书店。
- 陈峰,2009,《国家、制度与工人阶级的形成——西方文献及其对中国劳工问题研究的意义》,《社会学研究》第5期。
- 冯仕政,2006,《单位分割与集体抗争》,《社会学研究》第3期。
- ,2009,《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阶级和分层认同》,载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9 走向更有共识的社会:社会认同的挑战及其应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胡荣、张义祯,2005,《阶层归属与地位认定问题研究》,《东南学术》第6期。
- 李春玲,2003,《当前中国人的社会分层意识》,《湖南社会科学》第5期。
- ,2004,《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江苏社会科学》第6期。
- ,2005,《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9,《社会分层研究与理论的新趋势》,《中国社会学网》([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jgyfc/t20050406\\_5608.htm](http://www.sociology.cass.cn/shxw/shjgyfc/t20050406_5608.htm))。
- 李路路、王奋宇,1992,《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浙江人民出版社。
- 李路路,1996,《社会结构变迁中的私营企业家——论“体制资本”与私营企业的发展》,《社会学研究》第2期。
- 李培林,2005,《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研究》,《社会》第1期。
- 李培林、张翼、赵延东、梁栋,2005,《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培林、张翼,2008,《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第2期。
- 李强,2008,《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北京社会科学》第5期。
- 李炜,2004,《中国与韩国社会阶级意识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第5期。
- 林宗弘、吴晓刚,2010,《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社会》第6期。
- 刘精明、李路路,2005,《阶层化: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我国城镇社会阶层化问题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第3期。
- 刘欣,2001,《转型期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阶层意识》,《社会学研究》第3期。
- ,2002,《相对剥夺地位与阶层认知》,《社会学研究》第1期。
- ,2007,《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卢福营、张兆曙,2006,《客观地位分层与主观地位认同》,《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 卢卡奇,1992,《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
- 陆学艺主编,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马克思,1961,《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人民出版社。
- 马克斯·韦伯,1997,《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
- 迈克尔·曼,2007,《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刘北成、李少军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毛洁雯,2009,《当代中国中间阶级认同的形成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米尔斯,1987,《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杨小东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 聂元飞,1989,《地位象征和相对剥夺:主观分层的二律背反》,《社会》第7期。
- 秦广强,2012,《权威阶级图式的建构——基于工作状况和组织权威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汤普森,2001,《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
- 王春光、李炜,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主观性建构和客观实在》,《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
- 王宁,2001,《消费社会学:一个分析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天夫、王丰,2005,《中国城市收入分配中的集团因素:1986-1995》,《社会学研究》第3期。
- 翁定军、何丽,2007,《社会地位与阶层意识的定量研究:以上海地区的阶层分化为例》,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 吴乃德,1994,《阶级认知和阶级认同:比较瑞典、美国、台湾和两个阶级框架》,载许嘉猷主编,《阶级结构与阶级意识比较研究论文集》,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
- 吴清军,2006,《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理论述评——立足中国转型时期的思考》,《社会学研究》第2期。
- 吴清军,2008,《市场转型时期国企工人的群体认同与阶级意识》,《社会学研究》第6期。
- 郑晨,2001,《阶层归属意识及其成因分析——中国广州市居民的一项调查》,《浙江学刊》第3期。
- 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2004,《城市人口的阶层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 周怡,2003,《文化社会学的转向:分层世界的另一种语境》,《社会学研究》第4期。
- Harry B. G. Ganzeboom & Donald J. Treiman,1996, “Internationally Comparable Measures of Occupational Status for the 1988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
- Mary R. Jackman and Robert W. Jackman,1973,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38.
- Robert W. Hodge & Donald J. Treiman,1968, “Class Identifi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73.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责任编辑:赵联飞